

框外



要做一個醫生之前，必先做成了人，沒有完成的人格，不能盡醫生的責任。

賴和與蔣渭水，相同的台北醫學校背景，相同的身處日治時代的台灣人，相同的憂時憂民，他們為當時的台灣作出了一樣的診斷，卻開出了兩種不同的藥方；一個訴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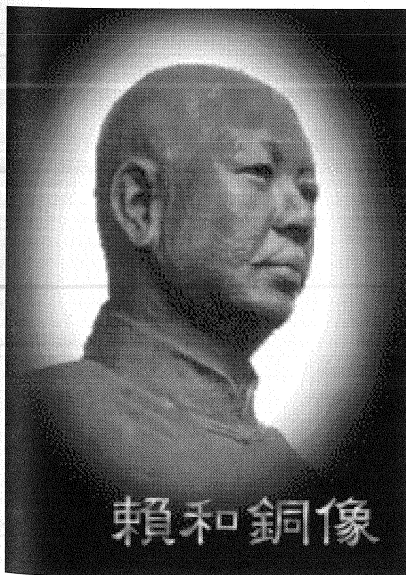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，企圖以新文學運動作為社會改革的開端；一個選擇政治，成為推動台灣島內民族運動的那雙手。走在“醫學”的框框之外，他們分別展現了驚人的熱情與氣度，站在時代的分水嶺上，回頭看看前輩踽踽獨行的足跡，重新審視自己，以及前方的道路，或許會有一番嶄新的醒悟。

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 - 賴和

賴和，日治時代典型的壓力下誕生的知識份子，畢業於台北醫學校的他，除了醫生的本業外，更參與了許多的社會運動或文化運動，而在日本的威權統治下，這些都是

具有重重綿密的壓力存在的團體。他在這些運動中，特別是參加新文化運動的自覺——也就是他的詩、文中一再提到「覺悟」，猶如他一生行動中不可少的一盞照明燈。

賴和的詩、文，都建築在抵抗強橫無理的凌辱、壓迫、剝削的動機上，站在人民的立場發言，他的小說人物都以一般弱勢的平民百姓為主角，從農民、菜販到婦女，都是他所關心的對向，而他批判的矛頭，更是廣泛的指向了警察、士紳乃至於官吏。雖然，類似的反映日治時代台灣人民在殖民統治下遭受不人道待遇的題材，是與他同時代作家或晚期作家筆下常見的故事，



賴和銅像

但是，以他一個醫生的身份，他大可以關在自己的象牙塔裡，享受既得的利益，將同胞的苦難鎖在診所的重門之外；然而，他卻選擇了與龐大的威權體系相抗衡，用他的紙筆、用他的文字，去抵抗那些令他憤怒的凌辱。即使這樣的正義感，也將他自己陷入統治者的監視壓力下，甚而兩度被捕入獄，但他仍堅持不站在自己的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說話，也不會記他個人的事，對他來說，文學創作的意義，在於社會運動的推進，他將新文學定位為，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上的台灣人民，抵抗壓迫與文化鬥爭的手段，和台灣人民思想的啓蒙運動。賴和領導文學加入抵抗運動，並為建立抵抗文學身先士卒，具有別人不及的抵抗勇氣和強度。

台灣政治史上的革命家 -

蔣渭水

若稱孫中山是「中國的國父」，那麼，蔣渭水則是「台灣人之救主」。

對世上許多政客而言，政治是權術與陰謀的代名詞，但對於蔣渭水而言，政治則是一種純潔的理想主義的無私奉獻。

從台北醫學校畢業之後，蔣渭

水在台北大稻埕開設“大安醫院”，其後，便以開業的收入，以及一些醫師同業資助的金錢作為他從事革命的基礎。他認為台灣人的問題在於患了“知識營養不良症”，而試圖以文化運動來治好



蔣渭水先生像

台灣的病；台灣文化協會便扮演著文化啓蒙的角色，廣納知識份子，從事社會改革。然持續多年的政治運動並不能改變總督府的專制獨裁。會員們漸漸覺得應該要組織政黨，朝取得權力的方向而努力。於是蔣渭水由熱愛鄉土的知識份子，搖身一變而成爲積極的社會運動者，籌組了台灣第一個民主政黨：台灣民眾黨，爲了組織台灣民眾黨，蔣氏先後組織了台灣自治會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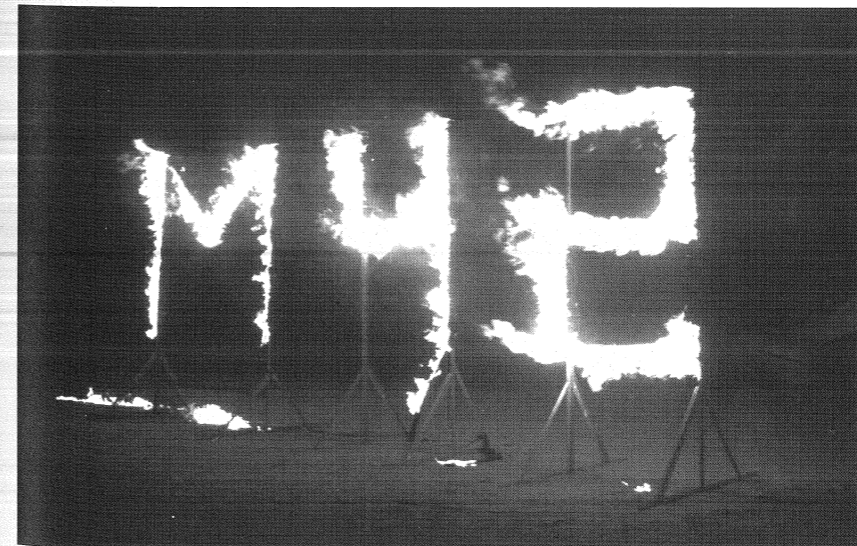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同盟會、台灣解放協會、臺政革新會、台灣民黨，卻被日本當局一一封殺，然而，當台灣民眾黨成立時，他們仍無視於當局的鎮壓，誓言追求民本政治、以及集會、結社、言論的自由。

如今，蔣氏在台北六張犁的公墓上刻著：「台灣革命運動，已進入第三期，台灣人的勝利，亦已迫在眉睫，凡我青年同志，務須努力奮鬥，而舊同志，亦應加倍團結，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，努力爲同胞求解放，是所至囑。」蔣渭水一生奮鬥，自始至終平藉著一股理想樂觀的精神，他的領導魅力即是來自於他始終不減的熱忱和堅定的理念。（節錄林衡哲著「雕出台灣文化之夢」成篇，以爲記）

自日據時代以來，台灣人的高級知識份子多棄法律、政治而從醫，而當地診所醫院的開業醫生除了在身體病痛方面的照顧之外，往往也扮演著該村鎮的精神領袖，負起了領導的責任，因而對這塊土地有著一份使命感，這種使命感代表著台灣的知識份子對這塊土地的情感，也是這份使命感推動賴和與蔣渭水冒著失去個人自由的危險，從事社會運動；但，隨著時代變遷，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的改變，物質生

活的提升等等，我們看到的，醫生的社會地位與負擔的責任也有了些不同。隨著醫療技術的愈來愈精進，對於人方面的關懷卻愈來愈疏離。除了看診之外，“醫師袍”所賦予的價值漸漸少了，醫師的社會地位與責任漸漸簡單了，醫師像高級的勞工一般，以自己的專業技術來換取酬勞，這樣的轉型是現今社會結構的必然趨勢？還是醫者自己將自己限在這個狹小的框框內？

醫，是和人最接近的一門科學，除了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之外，其餘的組成應該都可以說是“人文”的範疇。不管醫療的技術不斷地進展，身為醫學生的我們將來所面對是活生生的“人”而不是冷漠而單調的機械或程式，就某些方面而言，醫生更是面對民間疾苦的第一線，記錄在人的身體上



燭火映出對人生的尊重。

的生活的痕跡是再高明的化粧都不能掩飾的，人的苦痛、社會的晦暗總是赤裸裸的呈現在醫師的診間，這也就是爲什麼社會福利工作總是有賴醫師們的協助才得以進行。賴和醫師有句名言：「要做一個醫生之前，必先做成了人，沒有完成的人格，不能盡醫生的責任。」二十世紀的人是迷失的，世紀初經過二次世界大戰，讓生靈塗炭何來尊嚴？科技資訊數位化，取代了人與人的感性，使人冷漠無情。人被電腦所控制，醫師面對著電腦，打開電腦資料，看電腦資料，輸入輸出的是病歷碼、藥方代號，卻忽略了坐在面前的“人”——病人。只是專心在找病，結果病找到了，藥也開了，而人的靈魂在不知道在何方？像電影“心靈點滴”裡頭的老教授與醫學生，眼裡所看的只有

病歷代號；腦子裡所思考的只有糖尿病或腎衰竭等病名，至於這個活生生的婦人已經不是他們照顧的範疇，更不用說從這個病人身上去讀到任何更深入的意義了。

當“醫”與“人文”的鴻溝愈裂愈深，醫師所代表的已經不再是古早基本的熱忱與奉獻，取而代之的是與高薪、穩定的收入劃上等號，如此一來，現今醫學系所招收的醫學生大多是抱持怎樣的態度來看待這個行業？或許，一個醫學生，代表著是聯考所篩選出的一個分數；但一群醫學生所要擔的卻是一份責任，試想當醫學之途一路走過，回首檢視這數年來擁有的收穫，是一本本原文書和共筆的層層堆疊？是無數的病理機轉、寄生蟲和微生物？是一紙成績單及上頭的分數？這些，足以做爲一個能對病人有關懷、對生命有感動、對社會有責任的醫生嗎？相信你對這些問題也沒有肯切的答案吧！

身爲一個基礎醫學生，除了勉力在課本的夾縫中求生存之外，隨時保持一顆柔軟的心，讓自己在專業的象牙塔外也能擁有飛翔的能力，或許才是避免畫地自限的唯一方法吧！！

文/陳勇全